

近代拉萨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

王川¹, 杨永明²

(1.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2. 宜宾学院 政史系, 四川 宜宾 640007)

摘要:中国藏族地区的民间信仰繁多,由来复杂,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是中国民间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西藏拉萨地区虽然号称“法区”,但仍然拥有多种藏传佛教之外的民间信仰,在众多的中国藏区信仰习俗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其他藏区并无重大差别。

关键词:近代时期;西藏拉萨地区;民间信仰;民间宗教

中图分类号:B9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6)01-0110-06

中国的所谓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即“弥漫性的或非专门化的中国宗教”[1](1页)。可以说,“中国不仅有一部道教史、佛教史,还有一部变幻难测、扑朔迷离、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2](2页)。不仅中国内地存在着民间宗教,广袤的中国藏区在藏传佛教信仰之外亦同样存在着民间宗教。比如近代西藏拉萨地区就存在着众多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如关帝崇拜、土地神崇拜等,涉及的信众包括藏、汉等多个民族,既有藏区产生的宗教信仰也有传自内地的宗教信仰,并且与当地社会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论著相继面世[3],主要涉及民间宗教概念的界定、民间宗教体系的划分、民间宗教与明清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等四个方面[4],然而,对近代中国藏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研究仍显薄弱。鉴此,本文拟对近代拉萨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及其产生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 近代拉萨地区民间信仰与宗教坛庙

自从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定都逻些(今拉萨)后,拉萨地区逐渐成为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藏族文明的象征。从明末清初第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

以来,拉萨地区逐渐成为格鲁派的中心。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政府正式成立噶厦,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正式确立,在中央王朝等政治势力的支持下,拉萨地区格鲁派宗教势力不断兴盛,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藏区的佛教昌盛之地,有“法区”之称。现今的拉萨地区是西藏自治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了城关区、林周、当雄、尼木、曲水、达孜、堆龙德庆、墨竹工卡等8个县(区)。

在清代,在政教势力的支持下,拉萨城得到复兴,并逐渐发展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城市。随着拉萨城的发展以及中央政府官员进入藏区,尤其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开始,中央政府任命的文武官员入驻拉萨,清廷在藏区各城市逐渐建立了营汛台站,清廷倡导或默许的庙宇亦先后得以建立。一般来说,当时所建的相关庙宇至少包括三大庙建筑,即文庙(孔子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稍大一点的城市所建的庙宇建筑还包括文昌帝君庙、土地祠(即土地庙)、龙王庙、三官庙等。以拉萨而言,清政府在此设有粮务、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员,派驻有定期轮换的军队,因而拉萨地区的民间宗教坛庙集中分布于该地区的中心城市——拉萨城之中,此外,在拉萨各地尤其是交通线上亦有民间宗教坛庙分布。上

收稿日期:2005-09-0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藏区的民间宗教与信仰研究》(项目批准号:04CZJ00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王川(1969—),男,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近现代中国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杨永明(1969—),男,汉,四川通江人,宜宾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述这些寺庙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拉萨城、各县城及交通线上大多存在。

1. 关帝庙

三国时期蜀国军事将领关羽受到了传统社会儒、佛、道三教的推崇,历朝统治者对关羽的提倡及其对民众的广泛影响,使得关羽崇拜从一种民间宗教转而为三教并尊的神祇。明清时,关帝庙祀遍及天下,佛教以关羽为“大护法”,在许多佛寺中建“伽蓝殿”,供奉关羽,称之为“伽蓝菩萨”或“伽蓝护法”。清代,藏传佛教大师认可关帝融入藏传佛教体系。乾隆时期,国师·第三世章嘉·乳必多吉(1717—1786)还为祭祀关帝撰写了仪轨文。清朝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广建关帝庙,在藏区亦大力推行,当时川边的大小金川、打箭炉(康定)以及康区(里塘、芒康、盐井、洛隆等)、卫藏(拉萨、嘉黎)、后藏(日喀则)、藏南邻尼边境(定日、亚东)等地均建有关帝庙。如拉萨因“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后经“帝君显圣除之,人始蕃息,士民奉祀,称尊号曰‘革塞结波’”,于是“汉番僧俗奉祀惟谨”[5](卷6《寺庙》)。晚清时人说,“我朝崇奉关圣,自国初以至今日,所在勘定边陲屡照灵异,亚洲胥蛮,诚亘古而无俦,……开创之初,先崇报享,凛以尊亲,不得谓非转移风气之一助”[6](100页)。可见,清代以来,拉萨一地关帝崇拜之盛。在近代,拉萨地区的关帝庙有以下四座。

(1) 磨盘山关帝庙

磨盘山关帝庙位于布达拉宫西面约500米的帕玛热小山岗(因形似而被俗称为磨盘山)上,始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时大将军福康安率部入藏,将侵扰后藏的廓尔喀侵略军驱逐出境。次年,磨盘山关帝庙落成,福康安亲撰《磨盘山关帝庙碑》,赞扬并感谢关帝的“神佑”。由于庙系工部尚书、驻藏大臣松筠监建,又值康乾盛世,故磨盘山关帝庙成为藏区诸关帝庙中“体制之最崇者”[7](252页)。

磨盘山关帝庙现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建筑风格为汉式,主殿东西墙面上镶嵌着一个大碯,意在保佑建筑安然;主殿之后为一佛堂,即文殊殿(藏语称“绛央拉康”),所用瓦当有篆体“寿”字[8](380页),体现出中原建筑布局及风格。1934年9月19日,黄慕松在拉萨“参谒关帝庙”,见“上供关帝,旁列四像,尤门内塑马夫牵马像”,“殿内悬匾甚多,正中为乾隆六十年驻藏大臣、工部尚书松筠所献”,“此庙现由功德林寺派二喇嘛管理,因该寺即在山麓”[9](311页)。近几十年来,拉萨藏族人误认为磨盘山关帝庙供奉的是格萨尔王[10],因而使磨盘山关帝庙成为藏区与内地共同信奉的神灵。类似的情况在藏区其它地方也有出现,1950年前在昌都城建有一座丹达神庙,供奉“丹达大王”,后来供奉神灵演变为关羽,昌都藏族人则认为是格萨尔,成为藏汉人民“抽签打卦的地方”[11](311页)。

作为拉萨地区近代以来多座关帝庙中规模、影响最大的一座,磨盘山关帝庙既是藏汉满蒙各族人民团结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也是拉萨地区现存最大的民间信仰坛庙,还

是拉萨地区现存唯一的一座关帝庙。

(2) 吉日关帝庙(“云南庙”)

位于拉萨市吉日居委会辖区内。清代中期以后,一批来自云南的皮革加工工人到了拉萨传扬皮革加工工艺,有力地促进了西藏民间皮革手工业。噶厦政府为了鼓励这批工匠,拨了一块空地让他们修建了关帝庙。从此,凡在拉萨做生意的云南籍商人,不管其家境贫富与否,均需捐献一定数量金钱用于这座关帝庙的扩建,由此被拉萨人称为“云南庙”。庙中主供关帝,配供有土地神。一直到1959年时,该庙仍有人烧香、叩拜[12](48—49页)。

(3) 热木其石桥关帝庙

位于今拉萨市热木其居委会辖区内的热木其石桥。该关帝庙原来供有关帝像和查喜女神索吉布赤像。小庙门楣有汉文匾额,据云,20世纪50年代前,该庙之庙祝亦由汉族尼姑充任。

(4) 扎什城关帝庙

扎什城系清人对拉萨北郊扎什地方的称谓,这里原为流沙荒郊,被开发为兵营,后来驻藏大臣衙门、关帝庙、三光庙、萧曹庙、丹达庙、吕祖殿、财神庙、龙王庙、万寿寺(该寺属于汉传佛教寺庙,本文不涉及)及轿班住房等,亦先后在此建立。

扎什城关帝庙建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时驻藏大臣和琳亲撰《关帝庙碑》文,感谢关帝的“神佑”,并祈祝关帝保佑西藏的平安。至上世纪80年代,该碑仍存于大昭寺院内。

2. 扎什拉康(扎什庙)

位于扎什城驻藏大臣衙门东边,系18世纪末期驻藏官兵为高宗及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荐福祛灾而建。根据约20年前文物工作者的调查,“真实扎什拉康里面的主要神祇却是内地的神像。进大门以后,右边是一尊土地神,过去的旧帽上还有‘土地菩萨’四个汉字。左边的查细拉姆乃是内地的鸡脚神。传说古时有一帝王,生有三个女儿,其中最美的一個受嫉被害,后变为魔女危害一方。于是父王砍断了她的双脚。然而魔女却长出魔爪(鸡脚)一双,后遂成为护法神。很显然是清军官兵供奉的内地的神祇”[12](49页)。后来,拉萨藏族前往祭拜,逐渐在庙中另塑立扎什女神(即“查细拉姆”)索吉布赤之像于殿中,扎什拉康也就改称扎西女神殿。拉萨老人都说扎什拉女神颇著灵异,在当地很有名。此庙在近代“供养有等身高的关云长塑像和查喜(扎什)女神索吉布赤。据说清朝时候每年夏季把关云长的塑像请在轿子中,文武官员骑马列队,还有一部分人穿着古装衣服陪同轿子转八廓街”[12](50页)。此庙旧址位于今拉萨市扎细(扎什)居委会辖区内。

3. 财神庙(“才喜妙”)拉康

拉萨当地人谐音为“才喜妙”。拉康即藏语庙的音译。该庙旧址位于拉萨市八廓街居委会辖区内措那小巷内,有二

层楼高,房顶为木结构屋顶,庙中供奉财神赵公明。辛亥革命后,拉萨兵乱,时称“水鼠年事件”(1912)。财神庙在战乱中被毁,其地盘由噶厦政府“索南列空”(城市管理机构)收回管理。

4. 门冲卓玛拉康(小庙)

该庙位于今拉萨市城关区电影院西面。在庙的南面最初是一座祭祀龙妖的小庙堂,称为门冲龙妖(即门隅来的龙妖),因供奉龙妖的龙妖传说是跟随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从门隅来到拉萨。之后,又在该庙北面修建了小庙,因供奉卓玛像(救度母像)而被称为“门冲卓玛拉康”。该庙还供奉有关帝像、密宗事部三怙主佛像。小庙建筑面积为一柱(藏区传统建筑面积的计算单位,一柱约16平方米)。一直到1959年时,该庙仍受人烧香、叩拜、求签。1959年后,八廓街木如寺始派一名僧人前往该庙主持日常宗教活动[12](49页)。

5. 丹达神庙

位于今拉萨市鲁固居委会辖区内。拉萨当地人谐音“丹达(神)庙”为“党大庙”,系为纪念翻越藏东夏贡拉山的清军首领而建,其人塑像亦供养于庙中,乾隆末年受封为丹达神[13]。因此拉萨、昌都、成都及康藏交通线上先后出现了丹达神庙。据清张其勤撰、联豫补记《炉藏道里最新考》记载:“往来行人过必祈祷焉。前藏亦有两庙(指丹达庙、瓦合庙),均入祀典,春秋致祭无或缺。”[14](402页)

此外,近代拉萨丹达神庙并供有关帝像。近代时期,“常住在拉萨城内的汉族人常到庙内烧香拜佛,逢年过节还举行庙会,演出汉族民间戏”[12](50页)。在1912年水鼠年战乱中,该庙被毁,庙中关帝像被迁至热木其石桥长寿佛殿中供奉。

关于拉萨丹达庙的记载不少。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1904年5月15日),驻藏大臣有泰在拉萨于“丹达庙、吕祖(庙)前行礼”[15](30,91页)。民国元年,政局动荡,驻藏清军为藏军所攻,八月十四日(公历10月5日),拉萨清军“闻丹达庙、三光庙、肃曹庙、理事府、柳夏等处同时失守”[16](128页,129—130页)。在战乱中,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萧曹庙、丹达庙、吕祖殿等逐渐废弃。1934年10月4日,黄慕松在拉萨扎什城“视察前清驻藏大臣公署之旧址”时,目睹“其东侧原有之眼(三)光庙、萧曹庙、丹达庙、吕祖殿、财神庙、龙王庙及轿班住房,皆无从寻识。故宫禾黍之感,能不怆然”[9](337页),可见当时拉萨丹达庙已废弃多时。

6. 瓦合庙

瓦合神与丹达神类似,这两种崇拜的原型为清代康熙、乾隆时代的进藏官兵,至今尚存的清代碑文《丹达山神记》、《瓦合山神记》就是这两种民间崇拜的证据。这二种拉萨近代史上的民间崇拜,不仅在拉萨地区而且在川藏沿线以及拉萨、成都等地均有流传,在近现代拉萨地区有一定影响。

7. 土地庙(又称土地祠)

土地祠是祭祀土(地)神之所,土地神崇拜是世界许多民族原始宗教中的普遍现象。近代内地各县均有土地祠,稍发达的县乡镇亦设有此祠。在藏族的原始宗教中,亦有这一观念。藏族认为,土地神就是居住在地上的神,是土地的主人,藏语称“典玛”,即土神之意,管理着地上生长的一切植物,包括花、草、果树等。在本教的《十万白龙经》中,典玛住在须弥山顶的五宝莲花垫上[17](349页)。

拉萨城郊的土地庙位于今纳金乡藏热村北面山麓汉族墓地之侧。汉族墓地埋葬有清朝驻藏大臣下属、军人及部分商人的骨骼。这一土地庙似始建于清嘉庆(1796—1820)后期,根据现存《大清西竺义冢碑记》记载:甲寅年(1914),曾重“塑土地神像”;1932年,拉萨“重修土地庙”[18](91—93、133—140页)。1940年3月3日,重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汉人坟致祭”,目睹拉萨郊区汉人墓“墓前有土地庙一所”,“则民国十一年留藏孑遗汉人醮贤所建,有碑记,乃在地中掘出,内叙和琳、松筠创建事迹。庙侧有土屋一座,败瓦颓垣,以备看墓人栖止”,“今日义冢基址宏大,犹见前代规模”[7](273页)。

这一土地庙是当地诸汉庙中较大且有一定名望者,也是当地汉族人民祭祀先人时往往兼祭的坛庙,并成为当地藏汉人民抽签打卦的地方,举行的诸种祭祀活动生动且吸引人。这种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直到1959年才停止。2005年7月15日,笔者亲履其地考察,见土地庙基本形制仍存,但已颓废严重,《大清西竺义冢碑记》石碑仍立,墙面有多种吉祥纹饰,该地亟需维修并加保护。

此外,如前述,吉日关帝庙(“云南庙”)亦供有土地神。

8. 城隍庙

城隍庙是祭城隍神(守护城池之神)的坛庙。历代王朝均将祀城隍列入祀典,主要目的是祈雨祈晴、禳灾、保佑风调雨顺等。道教以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新任驻藏大臣有泰进藏,曾到昌都城隍庙“瞻仰”[15](299—314页)。

拉萨的城隍庙始建于咸丰二年(1852),时驻藏大臣满庆仿照内地惯例在扎什城中修建了城隍庙。光绪十七年(1892),德宗还赐过御书匾额,上书“西陲福佑”四字。据拉萨市文物工作者推测,城隍庙系与拉萨城墙同时被毁,匾额也不知下落[19]。

据记载,城隍庙毁于辛亥革命时。1934年9月13日,黄慕松在拉萨得知扎什城内“并有城隍庙及关帝庙,辛亥事变时,皆为藏人所毁”[9](298页)。

9. 龙王庙

近代藏区多处有龙王庙。如在西藏昌都龙王庙修有建筑物[20](96页),并有设于两河交汇处的祭坛“宗那措”,每年初夏时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之后进行泼水祈福活动。晚清驻藏大臣有泰进藏时,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6月曾至昌都龙王庙等处“瞻仰”[15](299—314页)。

在拉萨有两处龙王庙:一处位于龙王潭,光绪十七年(1891)驻藏大臣升泰曾奏请皇上给龙王庙和阎王庙赐匾问题;一处位于罗布林卡凉亭侧,1934年9月16日,黄慕松在拉萨罗布林卡凉亭见“屋后有龙王庙”[9](306页)。

10. 双忠祠

双忠祠旧址位于大昭寺东北,起因于乾隆十五年(1750)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在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今译居美朗杰)之乱殉职。二人殉职后,高宗认为“二臣协心甚苦,而有功于国家甚大,应特建双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充昭劝忠令典”[21](24页)。次年四月,高宗诏令在拉萨通司冈(今大昭寺北面)傅清、拉布敦殉职处建双忠祠。乾隆五十八年(1793),大将军福康安(傅清之侄子)入藏征剿廓尔喀,特至双忠祠拜谒,并于战事结束时,下令修葺祠庙,并亲撰《重修双忠祠碑记》,以满汉藏三体文字分别勒石塑碑,嵌于祠内过道两壁,碑文曰:“能捍大患,则祀之”。如公者,番民虽百世祀可也。”

直到20世纪初,双忠祠乃作为邮政用房,拉萨人习称其地为“查康”。到了80年代末,《重修双忠祠碑记》“仍嵌塑原处,保存完好”[19]。

清末,拉萨地区尚有观音阁、龙王庙、土地祠、关帝庙等。辛亥革命后,由于拉萨动乱,拉萨的城隍庙、土地庙等坛庙建筑毁于战火者不少。之后,还有被借用为其他公共设施者。拉萨解放后,城隍庙、土地庙等坛庙建筑,仍然发挥了临时性的社会作用,得以保留下来。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部分坛庙建筑被拆除或废弃。

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调查,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的拉萨内拥有众多寺庙,既有代表藏文化的藏式寺院,又有代表民间宗教的多种坛庙。在当时拉萨城众多的寺庙中,藏传佛教寺庙最多,拥有包括色拉寺、哲蚌寺等格鲁派的数十座寺庙。此外,拉萨城还有清真寺2座,至于民间宗教坛庙尚存留关帝庙、财神庙、土地庙等数座。至今完整者仅剩关帝庙一座了。

二 近代拉萨民间信仰与宗教产生的原因

第一,拉萨地区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之地,具有民族交融、文化内涵丰富的特点,因而在近代时期的这一佛法昌盛之地存在着藏传佛教之外的民间宗教坛庙。

在以藏族为主体的拉萨地区,藏族是世居民族且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因而藏传佛教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宗教。此外,历史上还有其它民族移居及宗教传入。

拉萨并非纯粹藏族聚居之地,内地各族人民在此亦长期生活。来自甘、陕、青、川、滇等地的回族从元明时期就迁入西藏地区。回族来到拉萨,起初多为商业人口,后来逐渐定居。在近代,定居拉萨的回族曾垄断了拉萨城的牛羊屠宰及零售。回族的迁入,亦将伊斯兰教传入拉萨。根据清代的匾文,拉萨清真大寺始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行了扩建。此处离清真大寺大约1000米的西面

有一座小清真寺,建于20世纪20年代[24]。

汉族在较早时间进入拉萨地区,较大规模则在清代中期。随着清朝多次用兵西藏及在交通线设置台站,以及粮务、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员的设立,大量军队驻扎于拉萨。部分官兵退役后,与当地藏族通婚,或开垦荒地,或做些小生意,逐步在当地定居,并生育子女,这些人逐渐成为了当地居民。现今拉萨的汉族亦部分与此相关。

20世纪上半叶,数次造访拉萨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贝尔(C.Bell)也不得不承认,拉萨“不纯粹是一个西藏人的城市。这里有从西伯利亚边境和西伯利亚本土来的蒙古人,从中国很多省份来的中国人,来自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人,来自中国土耳其斯坦(新疆)的人以及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西藏人。这种情况,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22](242页)。1939年,到拉萨学习佛法的汉僧邢肃芝(法号碧松、藏名洛桑珍珠)看到“这时的拉萨市人口大约两万多人,包括藏人、康巴、青海人、贺巴、蒙古人、尼泊尔人、不丹人、拉达克人、锡金人、汉人、英国人等,真是一个人种大展览场”[23](138页)。

不断迁入拉萨戍边、经商、务农的汉、回等族移民,由于语言、习俗等的差异,与土著及其他内地省份的移民间存在一定的隔阂。为了互相帮助关照,防止由于身居异乡而可能受到的歧视和排斥,利用乡土的眷念和共同的本土民间信仰因素结成了具有一定凝聚力的集体组织,并使这种组织以会馆、回乡会组织或民间宗教的形式出现,以定期聚会,联络感情。旅居拉萨的汉人、回族,以来自陕西、四川、云南三地为主,此外还有宁夏、青海、甘肃、北平(北京)等地,这些人在近代建立了数个组织,以此作为同乡、行业的议事所和联谊组织。以地域(原籍)划分,这些组织有“义济大会”、“忠孝大会”、“新盛大”、“孝义大会”、“孙祖大会”、“土地大会”等,入会者有数十家共数百人之众。在近代拉萨,能够满足汉、回族人精神生活需要的,就是庙宇、清真寺。庙宇建筑直接与当地人的精神生活相关,是满足信仰等精神需求的重要场所;同时,居住于近代拉萨的汉、回族在此相聚,进行社会交际,沟通感情,交流信息,满足了人类社会交际、互相关怀的心理需求。所以,修建民间宗教坛庙、供奉神像、祭拜祈禳、烧香许愿、崇信卜筮、参加庙会,就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第二,清朝政府及统治阶级的提倡或默许。

近代拉萨地区多神崇拜(信仰)的出现与近代中央政府尤其是清政府的“神道设教”、大力提倡不无关系。

首先,推崇关羽崇拜及大建关帝庙,是清代统治阶级的既定政策之一。通过宣扬关羽,彰显其忠义,使之成为朝廷与地方百姓共同敬慕的楷模,不仅符合清朝统治者所需要的道德规范,而且可以教化臣民,对稳定封建统治、增强民族团结、形成全民族共同的道德文化,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西藏昌都民间的汉族人“喜供关公、灶王爷”[25](8页)、“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惟关羽”[26](3566

页),关羽作为神灵,进入了藏族的藏传佛教及满族的萨满信仰神系[27](443—455页),成为了满蒙藏汉等众多民族共同的信仰,“不得谓非转移风气之一助”[6](100页)。

其次,中国古代传统祭祀制度规定可以祭祀符合条件者。如《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同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因此,清朝乾隆等皇帝为了鼓舞入藏清兵士气,将为国殉职的军人封为山神,列入祀典,按前引多种文集的说法是“忠尽成神”(又如黄慕松所说“以身殉职,精忠不朽”),实则符合皇帝提倡褒奖的范畴和中国传统祭祀制度的规定。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R-E. Huc)也说:“清朝皇帝习惯于这样神化那些其一生以某种千秋功德而名垂青史的文武官吏,大家对他们的崇拜形成了官吏们的一种官方宗教信仰。”[28](627页)

所谓“官方宗教信仰”也就是“国定崇拜”(State Cult)。国外学者公认:“国定崇拜可能会给利用信仰来控制平民的做法以合法地位,但社会管理者在摆布民众时,必定依赖官方信仰严格范围以外的信仰舞台。”[29](581页)有学者在研究民间宗教时指出,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民间供奉诸神都是在民间普遍设祠祭祀,形成礼俗,再由地方官上奏朝廷,予以制度化,否则便是淫神淫祠,必须禁毁”,因而,“诸神的神格完成与提升,是民众与官方的互动结果,儒家士人与行政官僚在其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对于民间信仰的文化生态,在不同的时空中,形成不可忽视的作用”[30](202—203页)。此言可谓近代拉萨民间诸神产生原因的最好注脚。

第三,藏区的人民经常需要面对难以克服的自然与社会困难,这些困难、阻碍是诱发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产生的重要原因。

中国藏区的自然条件艰苦,而自从佛教在藏区扎根之后,宗教氛围极为浓厚。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人们感到无能为力时,往往会渴望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各

种神灵便应运而生,因此在藏区神山、圣湖之类灵异之地甚多。所以,当人类面对无法克服的自然力量和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于是“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神就被造就出来了[31](29页)[32](667页),这是近代拉萨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产生的又一原因。

尽管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战争冲突中,关帝庙等民间宗教庙坛无不受战火影响,如瓦合庙、城隍庙等甚至被毁于战火,个别坛庙和土地庙因距城中心稍远而受到影响较小;1950年拉萨解放,文革等政治运动又一次冲击到民间宗教坛庙,拉萨地区的民间宗教与信仰逐渐走向衰落,绝大部分坛庙至今不复存在,导致了近代拉萨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式微或信仰主体的转变。然而,在近代时期,拉萨地区不同宗教的共存、互融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有藏传佛教及其寺庙,又有藏族的原始宗教,还有伊斯兰教及其寺庙,汉传佛教、道教及其寺庙以及民间宗教如关羽崇拜、城隍与土地神崇拜及其寺庙等。虽然经过近代历史的变迁,拉萨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坛庙现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但是,关公崇拜等至今仍对拉萨人民的信仰习惯有一定影响,这说明即使在号称“法区”的拉萨地区,人民的信仰习惯并非格鲁派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特征。这一神灵繁多、由来庞杂、具有汉、藏、蒙等多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宗教文化,历经近代漫长岁月而得以传承,在拉萨民众的生活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为拉萨民众拓展生活空间提供精神支柱,丰富了民众经济文化生活,并在参与社会教化、凝聚民族精神、加强边疆地区内向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拉萨民间信仰作为联系各族人民关系的纽带作用得到一定的强化,丰富了拉萨地区的文化内涵,是拉萨民间社会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的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Meir Shahar & Robert P. Weller edit. *Unruly Gods*.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3]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4] 王庆德.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百年回顾[J].文史哲,2001,(1).
- [5] 松筠.卫藏通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 [6] 段鹏瑞.巴塘盐井乡地理志[M].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三集[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 [7] 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吴忠信入藏日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 [8] 傅崇兰.拉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9] 黄慕松.使藏纪程[M].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
- [10] 拾言.关帝在西藏显灵的传说[J].西藏民族宗教,1993,(2).
- [11] 马丽华.藏东红山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2] 甲日巴·洛桑朗杰.老城史话[M].拉萨:拉萨市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出版,2005.
- [13] 王川.清及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丹达神崇拜[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1).

- [14] 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 [15] 有泰.有泰藏日记[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
- [16] 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录[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17] 陈庆英.藏族部落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 [18]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M].咸阳:咸阳印刷厂印行,1985.
- [19] 欧朝贵.清代驻藏大臣衙门考[J].西藏研究,1988,(1).
- [20] 王贵,黄道群.十八军先遣侦察科进藏纪实[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 [21] 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 [22] 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M].拉萨:西藏自治区社科院,1985.
- [23] 邢肃芝(洛桑珍珠).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3.
- [24] 房建昌.西藏的回族及其清真寺考略[J].西藏研究,1988,(4).
- [25] 刘赞廷.拉萨县志略[M].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 [26] 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7] 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A].王继光.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 2003[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28]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 [29]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三联书店,2000.
- [30] 李丰楙.从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A].东方宗教研究:第4集[C].台北: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中心,1994.
-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Folk Belief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Modern Lasa Area

WANG Chuan¹, YANG Yong-min²

(1.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2.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Yibin College, Yibin, Sichuan 640007,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ways and gates to god, ghosts and immortals in the folk believes in China's Tibetan Area. which have both national traits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have unique influences on the populace life, and become organic components in the folk culture and social custom in China. Although Lasa Area is thought as "religion area", in fact the belief and the custom of Lasa people is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ther people in China's Tibetan Area, and occupies an incontrovertible position in so many believes and customs of China's Tibetan Area.

Key words: modern history; Lasa Area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folk belief; popular relig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